

近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就他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作出了有保留的道歉，承認有關這場戰爭導致“伊斯蘭國”崛起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北京時間9月12日，美國貝格魯恩治理研究所主辦了一個以“後黨治理”(Post-Party Governance)為題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表示，該會議關乎目前世界選舉民主所產生的問題及其未來出路。而之所以提出“後黨治理”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為主辦者認為，目前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出現了大問題。這兩件事其實有着一一定的聯繫。

對比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世界矚目的自我改革工程，被視為“自由”“民主”標本的美國內的很多不足及其背後的制度性缺陷都被呈現和放大，而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還在于美國自身。美國所遭遇危機代表了一種“國家模式”的衰敗，也使其自我認同和宣揚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產生動搖。與此同時，美國在他國強推“顏色革命”的做法或許是在重蹈歷史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覆轍。

不過，這也為重新定義政治領域一些基本的價值觀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這或許也正是中國崛起帶給人類社會的其中一個層面的積極意義。事實上，中國或許為其他國家地區貢獻出了至少五個“普世價值”：保持強大的國家能力、立足于自身實際、不斷改革進步、漸進的方式、對外開放。

美國衰敗“自由”“民主”動搖

冷戰結束後，美國所代表和宣傳的制度模式得到普遍認可，幾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終級形式。然而在20多年後，在此次會議舉行之前，政治領域已經有了很多反思美國制度的苗頭。在冷戰結束前夕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不久前開始表達出對美國的悲觀論調，這主要見于他在2014年出版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福山基于20年的觀察，對其理論進行了大幅調整，並提出相較于民主和法治而言，國家能力對繁榮更為重要的觀點。中國官方和媒體對此表示強烈的贊同，認為這恰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模式。不排除福山正是對比和有感于中國崛起的案例而對美國有了新的認識和反思。

福山還提出，美國政治文化有三個主要的結構特徵，而目前這三個都出現了問題，相對於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門(也包括兩大政黨所發揮的作用)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過大，而受損的是行政部門；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由於聯邦政府管理結構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兩極分化，美國的制衡制度——其設計初衷是防止出現過于強大的行政部門——也就變成了否決制。

除此之外，福山認為“新興民主國家”也正在加速潰敗。福山所謂的“新興民主國家”主要是指在過去幾年里發生顏色革命的烏克蘭、利比亞、敘利亞、埃及，此外應當還有正遭“伊斯蘭國”肆虐的伊拉克及其周邊地區。福山的這些觀點與中國持久以來對美國的批判不謀而合，這可能也正是福山曾被王岐山接見的主要原因。只不過，由福山而不是中國方面提出的質疑，對美國而言更具參考性和說服力。

這可能說明，美國自身和其所宣揚的模式，不僅不是終結的形式，而且也並不是其他國家走向一種理想中的更加富強、美好、公正國家的必然途徑，甚或有可能不僅不能實現，反而導致倒退和苦難。如果拋開意識形態的固有觀點框架，而僅從結果來看，當下美國對其“自由”“民主”等一系列價值觀的全球推廣和實踐，與工業革命時期俄羅斯及之後的蘇聯所推廣和實踐的“共產主義”極為相似。

美國或在重蹈“國際共產主義”覆轍

蘇美在各自的時代被視為“正確”和“成功”的代表，兩國向全世界強烈推廣其國家形態，必要時使用了武力手段，接受國在分別應用實踐蘇美模式時，幾乎都出現了很多的嚴重問題。學習蘇聯的一些國家經過暴力革命後，也曾一度有過初期的快速發展，但隨後又陷入經濟不前、專制腐敗、體制僵化的困局，並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形態轉型為“蘇聯模式”劃上一個句號。

政論者從蘇聯的失敗和錯誤推導出美國的成功和正確，隨即便進入了美國向國外大力推廣和實踐其制度模式的新時代，中東、北非等地發生的顏色革命即是其表現形式。然而觀察其結果，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已陷入了困境，這或許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國應當有所反思。

同現今的“自由”“民主”一樣，一個世紀前的“共產主義”也曾是讓世界範圍內的民眾孜孜以求和不惜犧牲生命的物事，如今幾乎已被污名化，其原本理念少為外界所知。如今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也因美國的衰敗和顏色革命結局被動搖。而從蘇聯模式和價值體系的興衰再到美國模式和價值體系正在發生的興衰，當今政論者和主政者是否能夠從中吸取教訓？即使不能夠做到，至少也應當不再盲從美國仍在全球強推的“自由”“民主”等價值體系。

雖然“共產主義”幾乎已被全盤否定，但“自由”“民主”雖有所動搖卻未必會擁有的結局。動搖是源于美國對“自由”和“民主”的自我定義和夾雜有自我利益的推廣做法。因此，當下確有必要對一些基本的政治理論進行重新定義，尤其是有所動搖的“自由”“民主”，以及有被污名化之嫌的“共產主義”，同時也有必要對各個國家的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做出新的評價。

中國或貢獻五個“普世價值”

對於蘇美兩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模式，中國已經討論、探索、實踐和修正了近一個世紀時間，至今仍然爭論不休。比如，“自由”“民主”、“共產主義”三個詞彙仍然是中國輿論場

的高頻詞，往往能夠引發不同群體的激烈爭吵。不過，這種狀態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中國執政者曾提出24字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面就有“自由”和“民主”，這體現了其融合蘇美優點的一種嘗試和努力。或許可以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摸着石頭過河、駕馭融合左右、學習市場經濟並改革政治制度的過程，正是一個吸取以蘇美為主的當時國際社會政治優點的過程。其中最值得重視和強調的一點是，這需要建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實際之上，而且需要一個實事求是的漸進過程。

這可能也正是中國崛起對人類社會在政治領域的一大貢獻。當然，中國的現有制度模式同樣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終結形式，如果像蘇美一樣強推之，只會造成同樣的結果。那么，中國衝破困局“殺出一條血路”的價值在哪里？目前來看或許至少有五點：保持強大的國家能力、立足于自身實際、不斷改革進步、漸進的方式和對外開放。

對於“國家能力”，福山在反思美國時着重強調了這一概念，其實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存在一個強大的政黨，這在中國就是中共。中共為整個國家的存在提供了保障，為進步提供了可能，尤其對比美國、西歐陷入困局和衰敗，而中國正在大步改革，更能凸顯其優越性。中共是一個國家政黨，這雖然會難以避免地導致腐敗，但同時也能有效地避免整個國家的群體分化，進而陷入內部門爭和混亂。現在來看，即使是一黨制國家常見的體制僵化、官僚主義和腐敗等頑疾，也並不是不能解決，而且其集體領導也能在較大程度上遏制“政治鬥爭”。即使是體制相對完善的民主國家如美國，也並不能免于這些問題，而且還會受到“金錢政治”的困擾。

至於“立足于自身實際”，進入近現代以後，中國也曾不在不同時期有過不同程度的全盤西化或蘇化的嘗試，但如今中國的成功卻歸應于將其“中國化”。這主要體現為中共對“中國化”的主導實踐。先是有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有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蘇

美兩種模式盛行的情況下，中國始終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和立足中國實際的取捨。儘管“中國化”的過程中也有過探索的過失，但是立足于中國實際總是能夠提供檢驗和修正的標準，這為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提供了前提和條件。蘇美向國外強推其制度模式因此是一種失當的做法，而中國等少數國家地區能夠“成功”則堪稱例外。

至於“不斷改革進步”，這應當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理念，但是卻難以堅持。對於這一點，可能需要去理解“生產力”概念，以及生產力對生產關係決定意義。生產力、科技發展水平、國民素質、社會組織化程度等等，總體而言都會不斷提高，也會不斷產生新的問題，這要求政治制度需要不斷調整進步才會具有合法性，也因此沒有永遠正確的制度模式。蘇美先後遭遇的困境或許就有這方面的原因，在其向外推銷自身時，也就失去了深度自省和調整的動力，制度形態陷入僵化，問題隨之產生，並且被他國超越。

由此還能延伸出另一套理論，即如何認識和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既然國家社會是不斷變化和進步的，那么也就更多地從時間的維度來衡量，更多地觀察其變化過程而不是結果。如果一個國家處於動態的、不斷進步的過程之中，就應當給予肯定。這也是中國發展道路的“普世價值”所在。雖然馬克思側重於對“生產力”、“共產主義”等概念的設想和定義，而未對如何實現的過程缺少注意，但是中國的發展路徑恰好是一個補充。

至於“漸進的方式”，也比較容易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顏色革命則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並引發混亂和災難。其實有觀點認為，發生顏色革命之前的那些國家當時也處於一種漸進發展的過程之中。漸進的發展需要整體安全、穩定和持續的環境。對於特權腐敗、貧富分化等問題，都需要一定時間來解決。另外，“維穩”有其必要的一面。畢竟，每個國家內部都會存在利益的對立，發展中國家更是存在很多現實的問題。但這需要有很多前提，比如維穩的目的和方式，是不是為了大多數人利益，會不會不斷優化過程和解決問題。

至於“對外開放”，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經驗。封閉的國家幾乎必然會導致極端情況，也會失去自我調整和前進的動力，至少也是失去外部參考。更何況，如今的世界已是全球化時代。在這種情勢下，需要保持一種兼收並蓄的心態，既要堅持自身實際，又要敢於向外學習。已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仍然保持着發展的強勁動力，其實也得益於美國等方面所構築的巨大壓力。



中美“五張牌”

多维文章 麥琛撰寫



華人雄起！從鴉片血耻到習總訪英

喪失了豪情，對中國的批評遠多于讚美，尤其是那些精神層面的、管理層面的、政治層面(即民主)的東西。昨天一不小心，驟然打開習總訪問英國的巨大的歡迎場面，鼻子一酸，記憶屏幕拉回了從前，而且是173年前，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的悲慘景象。

如果還有一點愛國之心，還有一點激情，不妨對近代史翻一翻。看看南京條約的簽訂歷史，不免氣不打一處來，恨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奴顏媚骨。不顧人民的反對，膽小怕事不抵抗，急匆匆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割讓香港等沿海區域的《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又稱《江寧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時稱江寧)下關江面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亦奉華麗號)上與英國簽署《中英南京條約》。英國以武力迫使中國接受其侵略要求，中國的領土完整遭到破壞。

包括香港在內的五口通商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殖民掠奪和不等價交換的中心。而且，巨額賠償加重了清政府的財政負擔，轉嫁到人民身上，我國民衆的生活更加艱苦。

有了這樣一個壞的先例，此後，西方列強趁火打劫，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看到如此心酸的往事，不免哽咽，不免悲憤，不免燃起報仇雪恨的激情，不免產生振興中國的豪情壯志。

可以欣慰的是習訪問英國的過程，是振奮人心的過程。同學們有時間應該看看視頻，不免感到中國興旺帶來的巨大反差，如果沒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中國，英國不會這樣對待習。弱肉強食的社會，有錢能使鬼推磨。腰里有鼓朗朗的錢袋走遍天下無敵手。

是的，我也與有些同學一樣，常常寫批評中國文化的東西，也彙彙為當今政府提出看法和建議，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架式。當然住在西方反東方，似乎問題不少。怨婦罵蠢夫，評頭品足容易得很，把國家交給我手中能否掌控好又是另一回事呢！

我們應該珍惜鄧小平等等中國領導人撥亂反正帶來的希望，他後面的幾屆首腦維持了這種穩定的發展，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動亂或倒退，進而取得的不菲的成果。當然，我們可以繼續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再說一遍，我們也要充分肯定國家興旺發達的鐵的事實，為近三十年來的輝煌成就而高興。不然，我們會走向魯迅曾經走過的歧途，落入世俗的狹隘的眼界，看不順眼，又沒有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案，看不慣人家，卻又不能為別人指明前進的方向。

送交者：小思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www.bmdllc.com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律师团队, 数十年的法律执业经验, 合理的收费标准, 以及良好的信誉与口碑, 确保您享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保护您的法律权益免受侵害。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在俄亥俄州及佛罗里达州共有 4 个办公室, 拥有近 70 位专业律师, 曾代理过政府部门、各类公司的复杂案件, 赢得客户的信誉并享有极高的声誉。

精办各项法律业务:

- ◆ 商法以及公司法
- ◆ 移民
- ◆ 法律诉讼
- ◆ 证券交易
- ◆ 兼并收购
- ◆ 国际法、国际贸易与投资
- ◆ 房地产
- ◆ 医疗保障法
- ◆ 劳动雇佣法
- ◆ 遗嘱信托
- ◆ 知识产权
- ◆ 破产法

语言:

- ◆ 中文
- ◆ 英语
- ◆ 西班牙语
- ◆ 俄语
- ◆ 德语

徐佳佳 律师

作为一名在 中美两国都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双语专业律师, 徐佳佳律师了解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理念、背景、渊源及其民族文化, 这也使她能够更好地与客户沟通、了解不同客户的需求, 并能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国际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联系方式:
 直线电话: 330-253-9195
 直线传真: 330-253-9121
 邮箱地址: vjxu@bmdllc.com
 办公室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